

导论

全球化——“第三世界” ——前景忧虑与赶超希望之间的文化

“没有人能抵制全球化 在基础设施领域,全球化是这样一类战争 杀人或者被杀。”

—— 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与发展部部长哈哈拉普先生 1994年9月。(引自 彼得雷拉,1997, 285)

“全球化”——一种多含义多层次的概念

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方面,几年来‘全球化’成了一个极富讨论和争议的话题。它已发展成一个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不仅带来

了不安宁，而且必定成为专业讨论中对立面的佐证。这是市场和国民经济一体化、分离化和工业化的共同作用，同样也造成混乱，引起不安。首先，它体现了政治与经济之间、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之间存在的含糊不清的关系。显然这是一个从民族安全国家向国际竞争国家转化的过程，至少对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是如此。对此，经济或者说开放的国民经济新自由主义理论似乎赢得了胜利，而主张市场政治调整的左派立场（凯恩斯主义）则被迫转为守势。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全球化看做一个过程，而政府却阻止实行违反市场理性的经济社会政策。经济联盟由此提出了工资纪律和社会国家退却的要求，以保证产地竞争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产地欺骗”和“全球化陷阱”的批评者从中预料到一场战争即将到来。（克赖勒1999,605）

更狭义的全球化在大约 30 年前即当第一个全球性通讯联络系统建立时就开始了。这一系统创立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如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24 时制全球信贷市场……假如可以说，在全球化第一阶段，西方控制了整个全球化过程的话，那么现阶段则没有人再能控制。”（吉登斯，1999,3）随着“亚洲危机”的爆发，情况可能有所改变，因为在此期间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如政治上失控的市场引起的混乱更多，带来的福音则少。至少是在世界银行，作为市场矫正行为的政治上负责的交易又重新受到欢迎，真是令人惊讶。^①以科学为基础的“认识和思维模式变化是多么快！”

本文要说明的是争论激烈的全球化讨论的几个主要方面，而

^① 约瑟夫·E·斯蒂格利兹——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 1999 年 5 月从亚洲危机中得出了引人注目的结论，并且为“后华盛顿共识”辩护：“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体制——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和维护它，就很难有效地调动储蓄收入，利用资本。如果经济不具有真正的竞争力，自由贸易和私有化的优势就消失在‘寻租’中，而且也不能朝着创造财富的方向发展。”（斯蒂格利兹，1999,30——外文引文已被译成德语）

且以非欧洲文化的思想和经验领域为中心。因此，全球化在重要的概念和内容方面必须清楚明了，这对于不同区域理解全球化是完全必要的。在这里，我们应该将第三世界以前的四个政治地理大区域理解为简称的“世界文化”或“文化圈”（不包括“第二世界”），这些区域以特定的政治主张联合成区域组织。它们有着共同的经济忧虑和发展任务，并且在文化方面截然不同。通过它们在世界交往中各不相同的立场来展示他们共同的特征。西方以它对其存在大约 1500 年之久的文化的强大影响而明显区别于所有其他文化圈。它推动了现代化、工业化和计算机化的进程，并且使其成为“世界大事”，从中没有一个社会能逃脱没落的惩罚。

但是，伊斯兰以其具体而又颇具威胁性的新形态的重新强大，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及拉美文化圈国家（智利、巴西、墨西哥）的勃勃生机充分表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机会是绝对难以阻止和掩盖的。对此，塞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推测只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而并非现实的可能。（米勒，1998；森格哈斯，1998）因为要更深入地研究全球化的渗透作用不难使他认识到，作为现代化的后果，全球共同问题所产生的更多的是共性，而不是实质性的差别。那些认为像“西方”一样“成熟”的区域文化正面临着衰败，而且超过了无所不包的世界意义的“黄金时代”，甚至也已经不再有能力进行“自我保护”等等看法（亨廷顿，1997，499）都属于文化历史思维方式范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法不能适应面向 21 世纪的当代潮流。那么又有谁能够说出“西方”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呢？现在“第三世界”不也在越来越多地大谈特谈第一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集团的“全球城市”而闭口不谈“第二世界”吗？

也许普遍认同的是，“全球化”描述了民族国家边界消失和超越边界的（新）相互联合的过程，它的结果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也不完全相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致可以分为至少四个

具有不同发展前景的地区。这里的地区不是指原始的地理界限，而是指在适应还是反对全球化的问题上采取不同行为的一种社会类型：

- 军事相当安全和经济繁荣的地区(西欧,北美)；“民主和平”的区域；

- 迅速变化、解体和无政府状态地区（撒哈拉以南和伊斯兰文化圈的部分非洲地区，前苏联周边地区，哥伦比亚、秘鲁的不安定省份等）；

- 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地区：以非同寻常的经济发展迅速工业化的社会（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转型国家）；

- 转型社会：社会内部的民族化和国家的构成完全处于进行和变革之中的国家（高加索共和国及其他相关地区）以及不安定但在继续现代化的全球化漩涡中连续开放也必须开放的国家（伊朗、北非、近东和中东）。

一直在反复讨论的问题是，全球化究竟有何新奇独特之处，以至于引起对共同前途如此的担忧、希望和推测？欧洲的海外扩张和前现代社会的“渗透”——就如同殖民主义的老话所言——难道不是一种过时的统治方式？或者是，过去殖民化世界的人们早就开始感受到自己是全球化世界秩序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尽力共同塑造它。我们试图对此问题作出回答。

历史性的世界转型：作为边界消失、网络化和现代化的全球化

大卫·赫尔德领导的伦敦研究小组的全球化概念广为流传：

“我们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网络和社会系统在空间上不断扩展，人的行为方式、积极性以及社会力量的

作用表现出洲际(或区域之间)的特点。(佩拉汤等, 1998, 136)

全球化包括多种相互交织的跨越边界的交流过程, 这些过程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政治上也为所有繁荣中心地区所要求。此外, 如下内容也属于全球化含义:

“日益增加的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跨国流动; 借助于新的通讯技术从而变得更加密切的网络化; 通过分散不同产地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所形成的更为复杂的国际劳动分工; 思想、概念、图像和消费方式及消费品的快速流通; 不断增强的全球风险与危机意识; 跨国机构和全球网络化; 政治运动数量的上升及其意义的增强。因此, 它涉及到这些过程在纵向和横向即在国家、次国家和跨国层级上的相互渗透。(伦德林, 1998, 16)。

在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费迪南德·布兰德尔、莱因霍尔德·本迪克斯、福尔克尔·博恩希尔、哈特穆特·埃尔森汉斯和迪特尔·森格哈斯等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体系理论家思想传统中, 美国社会学者罗兰·罗伯逊(全球化概念的普及推广者)把全球化定义为历史上规模宏大的本来起源于欧洲的转型过程, 这一过程以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危机为始端。同时他将这种构想的四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或者起始点与全球化区别开来。经验论分析家们借此进行认识并对全球化加以诠释。同时, 它们也体现了数百年来全球化过程得以进行的形式(罗伯逊, 1992, 27):

- 民族统一社会(民族国家)
- 社会国际体系(世界体系)
- 个体(具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 人类概念(世界)

一方面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消除世界与空间限制的过程, 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密集化和网络化的过程。国际贸易已存在几个世纪, 但新的国际贸易呈现出批量化、网络密集化和多元化, 而且由新的具有机动反应能力和灵活性的经济行为体即所谓

全球角色来进行。最重要的资源是有关复杂关系的科学技术知识。通过网络化运行体制，国家秩序和世界秩序不仅在机构程序方面，而且在物质上从社会政策直至安全政策各方面都全面地建立和发展起来。(舒曼,1999,73)

在目前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当中，全球化有如下4种不同的主题性的意义：

首先，只有当事情涉及到需要描述全球范围的环境危机的特征时，才可能谈论全球化。“环境破坏既不受空间限制，时间上也不可转换，既无等级也与产生地无关。它们的作用是全球性的，而且形成危机网链，在世界范围内使危害者和受害者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亨斯巴赫,1997,4)

第二，全球化被理解为西方的经济制度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扩张与征服。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化）和民主形态（民主化）体制得到传播。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不发达经济在工业化国家占优势的世界市场上遭到排挤。

第三，全球化意味着工业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扩张所引起的反作用及其不断增强的世界市场一体化和竞争力（尤其是新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其后果是加剧了工业化国家的各企业、部门和地区适应变化的压力，比如在德国、法国就已经导致了一场全球化恐慌。这里常常被人遗忘的是，(西方的)“积极的全球化”先于(在西方的)“消极的全球化”发生。全球趋势预测2005项目是可以理解的，即随着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增大，“反全球主义”的反应也将增加。文化的多元主义、宗教的分离主义、种族部落主义——所有这些都是“以地方、部落或民族形式增加的寻求同一性”的表现方式。

第四，随着经济、通讯和运输体制的全球化，投机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如失业、贫困女性化、刑事犯罪、毒品交易等也随之国际化，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犯罪的全球化。像适用于被盗的汽车、

重珠宝首饰或非法获得的金钱一样，全球交通运输网络也适合于毒品和武器的运输，因而经济犯罪和传统犯罪之间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分清。近几年投入和洗出的黑钱爆炸性的猛增，据估计，每年非法洗钱数量高达 5000 亿美元之多。（肯德尔，1999，6）

我们还可以区分出全球化的许多其他方面，不过在此不再进行详细论述。但是“全球主义”和“全球化”的重要区别则不可回避。（阿特法特／曼科普夫，1996）乌尔里希·贝克将“全球主义”理解为“世界市场排斥或者替代政治交易，即统治世界市场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以单因果和经济主义方式行事，并将全球化的多个层面简单化为一个方面，即经济方面，即便经济方面也还只作了线性思考，而把所有其他方面如生态的、文化的、政治的、市民社会的全球化，如果确切如此的话，只置于世界市场体制中的从属地位。”（贝克，1997，27）全球化在此不是被理解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专门经济负担造成的结果，即便政治对它也完全束手无策。尽管有足够的论据证明，目前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控制能力之间继续存在着剪刀差，但是我们仍然期待着全球化状态能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推动力。

世界范围内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全球化大讨论：代表性观点

几年来在现代社会各区域都存在着全球化的争论，其起因是世界经济中突然发生的、难以理解的变化。历史进步就是在推动中辩证地跳跃前进，但绝不是平坦和均衡的，以至于它总是伴随着怀疑和牺牲，假如像“全球趋势——2005 项目”的预言符合实际的话，即“全球化意味着我们整个社会所有机构包括我们的学校、工作岗位、信念和政府在内的全面社会性大转型”。（战略与国际研

究中心,1997, 1 和 14) 那么可以理解的是,1998/1999 亚洲政治和金融危机这场闹剧必定会被理解为一种持续现象的征兆——战争门槛下的激烈变革可能将成为 21 世纪的正常状态。

全球化的赞成者和反对者所争论的是新现代化攻势是福还是祸。有一些人——我们称之为乐观主义者——他们即使不承认,也还是把世界经济迅速增长的巨大机会看成是落伍的(极端的全球主义者),而另一些人——悲观主义者——尤其抱怨即将出现的由“做法相同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全球行为体所造成的民族自治状态、祖国情感、舒适和民族特点的丧失。一些人要求对当地经济作必要的结构调整,以产生或取得竞争力,而另一些却抱怨全球化的后果,并且拒绝通过削减福利国家、反调整、灵活变通、私有化、减少社会生产中的国家份额等来向全球化屈服。首先提到的那种观点的依据是,人们认为只有顺从适应全球化才能拯救和提高现有的富裕水平,而后者则想通过坚决抵制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巴西总统昂里科·卡多佐堪称全球化乐观主义者的典型之一。

“市场也有它的局限。正是这种认识使我们发展中国家陷入必须依靠政治措施来维护国家利益的处境。然而,这些用来调节全球化过程的政治措施,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也各不相同。无论我们愿意与否,经济全球化已是新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我们的措施发挥了作用,我们就应该完全现实地接受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政治上无所作为,反而为我们走上国际舞台提供了崭新的前景。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的区别,南方绝不是铁板一块。通过全球化,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彼此利用国际投资和贸易潮流的不同程度。”(卡多佐,1998, 10~11)

在此,我们将全球化忧虑的一个本质方面描述为:处于发展和贫困化地区的南方正在走向衰落瓦解(南方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整体),由此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种族隔离。

另外在欧洲,《经济的恐怖》一书作者维维亚娜·福雷捷,正在

出版书名为《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皮埃尔·布尔迪厄（布尔迪厄，1998，47）和在肆无忌惮的全球化攻势背景下不得不发出“自由贸易的致命病毒”警告的霍斯特·阿夫黑尔德（阿夫黑尔德，1994）等人都属于全球化悲观主义者。他们的忧虑都集中在老工业化国家劳动人口的社会排外主义这一点上，因为对劳动社会来说，作为加剧的国际竞争的后果，（有酬）劳动已经宣告结束。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可能成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的基本问题：如何安置想要工作，但在全球化了的世界上又找不到合适工作岗位的庞大的劳动大军？

自从 18、19 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和社会进步已经与有偿劳动和劳动分工结合在一起。在现代劳动分工的经济社会里，这被称为支付报酬的劳动，因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是国家合法要求的基础，它也是个人引以为傲并获得社会承认的基础。本世纪末，劳动已成为社会分裂瓦解的因素之一。

“现在，进步的共同之处越来越少，劳动分工不再相互合作，空洞的创新概念代替了进步。……尽管进步一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它还是承诺共同的富裕和发展。相反，创新则主要地被看作是经过进化的更新。它总是不断要求人们摆脱社会结构中通过技术可以替代的多余的部分。”（科赫，1998，385）

民主社会的社会凝聚力的后果是令人担忧的，因为“随着被裁减劳动人员的增加，社会正处在衰退中。在国家中这会使越来越少的公民对民族、对公共的民主承担义务。伴随着由劳动造成的分裂，政治堕落将不断增加。”（科赫，1998，385）

（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和批评全球化的《里斯本小组》主席里卡尔多·彼得雷拉对全球行为体的无止境的竞争发出了警告。他看到“受全球性社会种族隔离”影响过的世界像破晓的黎明般近在眼前。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将会逐步地失去与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广泛而且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他们不是参

与使新的“全球世界”得以产生的日益增长的相互结合和一体化，而是在相反方向越走越远。分裂情况发生在几乎所有非洲国家、亚洲（东南亚几个国家例外）、拉丁美洲绝大部分地区以及前苏联和东欧。……而且分裂情况也发生在洛杉矶、伦敦、东京的内部，它不是贫穷国家的特有现象，而是一种全球性的结构过程。（彼得雷拉，1997，297）

在现代世界本无居所的“全球城市”里是那些全球行为体，即跨国公司及其在各地的子公司、国际组织以及那些全球和地方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们在拍板定调。它们虽然无处不在又无处为家，然而又总是频频成为各种事件的焦点。全球城市也是全球化的原本的实施地点：在当地特定的环境里，全球性事物可以被感受到。大约在交易所、时装店、在艺术宫殿里，尤其是在全球性公司那里。为了拥有一个共同的未来，不同出身来历的人有时必须学会共同相处生活。由此创造出新的认同性来作为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扎森，1998，XXXII）

除了全球化乐观主义者和全球化悲观主义者之外，在当前的全球化讨论中还有第三种观点应该受到重视，那就是全球化的怀疑派和（可能的）全球化现实主义者。这里可用匈牙利的投机商和慈善家乔治·索罗斯的论点作为典型来加以说明。乔治·索罗斯看到了全球引发的资本主义的作用方式，垄断和卖方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会破坏所有已经发展的社会平衡状态。不久前，他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一个“庞大的循环系统”作了比较，这个循环系统将以它现有的形式给第三世界带来巨大弱势和风险。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系统，“它先将资本吸引到中心，然后把它投资到边缘地区。这个系统的阀门是那些居统治地位的国家，这个阀门总是向全球化金融市场的扩张敞开的，而一旦资金外流变为输入时，阀门就成为障碍，并且（在边缘地区）导致系统崩溃。”（索罗斯，1998，168）因此，索罗斯不是用基本的内部原因来解释目前

的亚洲危机(“矿工资本主义”腐败等),而是把它看成是“国际金融系统自身病态”的结果。“危机不只是局限在亚洲,也涉及俄国、南非和巴西,并且有力量影响所有欣欣向荣的市场,只有这种设想论证了‘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来自国际金融体系自身内部。’但是,金融场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像经济学理论通常所写的那样:“它不能像一个钟摆在经过强烈摆动之后依旧能回到它的平衡点上,而是“更像一个拆除机的大重锤,从一个国家挥舞到另一个国家,最终瓦解最弱小的市场。”(索罗斯,1998,113)

第三世界的讨论:边缘化的妇女,“新贫困”和全球化的社会代价

如果人类社会的社会分裂和排外不断加剧的话,指日可待的便是受害者的自我反省,这也是对自身认同的自我保护。这一情况大多是对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有意识的反应。这种全球化被非欧洲社会的知名人士认为是世俗主义、西方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对自身“神圣”传统的攻击。在一些国家里,人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全球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作用,而且这种影响通过各种对立和矛盾批判性地反映出来。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一方面连同与处境相关的基础知识在内的知识贮存(特别在妇女身上)遭到了破坏,也失去了价值,(迪特里希,1996,343ff)而另一方面全球化经济却又削弱了家族式歧视的统治地位(等级制度、童婚、否定妇女财产所有权)现代发展的力量——资本主义企业和现代学校——为妇女开拓了新的发展机会,不过这又成为全社会高昂的代价:在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获益者和无教养的妇女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生产环境的受害者中,妇女运动进一步分裂。(班纳吉,1996,

143) 全球化还加剧了“生活性生产”和“赢利性生产”之间的矛盾^①。这是一个在边缘化人口占有很大比重的社会里无法消除的矛盾。

第四世界究竟如何将全球化管理为西方社会不公正世界经济秩序的强制推行，这可以以（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第三世界网络台台长马丁·科尔的阐述为例。他把多数发展中国家视为“全球化的消极接受者”，它们毫无保护地听任边缘化命运的摆布。随着“布雷顿森林”机构方面解释权的难以置信的增强，国家的主权逐渐丧失。因此，在‘南方的观点’看来，全球化是‘作为一种得失分配不平的极为不平等的过程出现的。这种不平衡的后果是两极分化，即少数国家和集团从中获利，而多数国家和社会集团蒙受损失或被挤到了边缘。所以，全球化、两极分化、财富集中化和边缘化彼此联系在同一个过程中’。(科尔，1998,5)科尔认为走出这个死胡同的惟一途径是在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下推进国际机构的民主化，加强联合国系统，并以这种方式通过“全球治理”，以期能更早地实现更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远见构想。

结构调整要求成为南北关系中的一个基本话题并非偶然。与结构调整政策相联系的对特权集团收益的非议（它通常导致退休金一类收入的减少）已经成为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关系中的一种长期的政治冲突。（贝茨，1995）在这种变化中，‘新的贫困者’就是结构调整中的真正的受害者——他们与结构性的穷人不同（那些人一直是贫穷的，因为他们与市场经济没有联系，而且少有机会和途径获得人造降价商品和服务）。这种新的贫困化是由错误的经

^①关于印度的全球化讨论和结构调整政策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尤其是对农村地区妇女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的专题研讨会及其文献资料来详细了解，请参看班纳吉(1996)和迪特里希(1996)有关印度甘地运动的目标、行动方式与局限的理论文章。

济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严厉的紧缩计划造成的后果。它导致了需求、公共开支和实际工资的下降以及紧缩信贷政策的实行。（特茨拉夫／诺德，1996）新贫困者在阿根廷称为贫民社会，他们大多属于有教养的中等阶层，但正处于没落之中的群体成员。这些新贫困者包括哪些人呢？德尔加多是这样描述的（1995，57）：

“新贫困者主要是在公共事业单位的就业者、失业者、教师、养老金者和受冷落部门的年轻科研人员。此外，还有在国家服务机构或其委托单位工作的原本就收入低微的那些人，他们现在还能感受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可以支配的薪金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这种情况波及到大多数的军人。收入微薄的退休人员是这种新贫困的典型。因为，要是他们没有能在经济上援助他们的子女的话，他们就会被挤到社会的边缘。……这同样包括 45 岁以上再也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

与其他转型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相类似，阿根廷的全球化受害者的状况完全可以与除了台湾之外也许属于正在赶超现代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的南韩这个亚洲国家的低层就业者的情况作比较。在这个高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危机”便导致了哪怕只是暂时性的可怕的社会动荡：在短短几个月里失业人数达到了创记录的几乎 200 万人，仅是 1997～1998 年破产的企业达 1 万家。在经济衰退的高峰期每天就有 1 万人失业，80% 低收入阶层（比就业者收入低 20%）因经济崩溃的影响使他们收入减少了 5%～15%。在意识层面上，危机受害者产生一种对“美国式残酷资本主义”的反感，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这种美国式资本主义排挤了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特别是那些“正式的职员，他们对自身遭受市场经济的处罚感到愤怒”，然而正是得益于这种市场经济，他们取得了迄今令人惊奇并为儒家道德所认可的社会发展成就。（帕沙，1998，535～536）

阿根廷和南韩并不是个别现象。其他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鼓动和组织实施结构调整性改革计划的国家也普遍地——尤其是在社会底层——产生了主要的消极影响作用，特别是在收入和就业、价格(尤其基本商品)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特别是教育和健康方面)等领域。遭受结构调整政策消极影响最严重的当数“那些社会阶层”，即“他们刚好生活在贫困线之上或以下。……尤其是那些由女性造成的正处于危险之中的贫困家庭，在结构调整下，他们的社会状况明显恶化：由于所受教育较差，存在文化障碍和严重的歧视，女性很少有机会来改变自己的地位状况，也很难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西博尔德,1995,25)

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由南向北的各种移民是这种变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奥皮茨,1997)由于全球化效果的影响(由贫困所决定的)来自南方的移民压力肯定会进一步增大：现代化的通讯联系工具使人们能够目睹富裕和安全等方面的差距，大大改善的旅游条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克服这种差距的机会，但主要的是本身就包含并宣传鼓励社会空间流动性权利的西方价值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蔓延，对人们逃离家乡起了鼓励作用。

文化对经济的意义：调整压力下的世界 观与时代观

文化可以理解为共同经验存储的总和。面对反复出现的问题，它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导向系统。经验的存储和这个导向系统使个人能够主观地认识自己和本地的“我们群体”，同时也能够区别与‘其他人’和‘陌生’环境之间的虚拟界限。因此，可以将文化看做是一个由意义结构严密编织的网络。这个网络围绕个人并通过由社会化所决定的习惯感觉和思维模式对个人的政治行为发生影响。它并不取决于所谓文化价值的“纯洁”（这本来就没有人能

够最终加以断定！），而是由具体情景中支配人的行为的文化世界观的内在意义来决定。

文化具有调节作用，因为它通过鼓励和惩罚促使人们规范自己的价值理性行为。在这方面，与其他传统相比，有几种文化传统明显更适合于激发人们寻求积极参与全球化市场的机会与风险。虽然比较文化——社会历史研究对此还处在如履薄冰的境地，但是这种观点几乎不能反驳，比如说一种受到儒教影响的效率伦理学要比非洲那种传统的保守平等伦理学更有益于全球化。这种非洲传统的伦理学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认可了自私利己的竞争行为。

不久前，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为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迪尔凯姆传统中的“历史文化学”辩护。针对由传统社会历史造成的对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的普遍偏向，他竭力维护“文化思想结构和世界观以及宗教信条与仪式的优先地位”，认为，正是这些因素才形成“真实”（韦勒，1998,9）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多的民族运动、种族文化运动、宗教运动及其共同体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我看来，对这种人类社会“真实”的文化依赖产生的方法论思考是解决我们所关切之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这一条件使我们能理解那些在非欧洲国家由经济全球化引起的讨论。在这里，人们所重视的并不是我们的全球化状况，而是其他人即我们的竞争对手或我们合作伙伴的世界观的形成、改变或者贬值。在有关全球化压力下人类共存条件文化对话的出路问题上，这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这方面，所有世界观都经受了艰难的利益现实的长期考验，也就是说，它们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由全球完全资本主义化所产生的对非欧洲文化的现代化压力变得更为强大而且广泛存在，一个人类走向自我的长达 500 年旅程的新时期到来了，——但又不清楚明确的目标。现代化的最新阶段“将文化进化从缓慢的过

程中拯救出来，继而强迫它们进入飞速发展之中。文化的惯性也许很大，但它并没有减轻现代化的现实压力。各种文化都被卷入了一场迅猛而且常常伴随痛苦变革的漩涡之中”。（米勒，1998，35）从一切迹象看，这是一种有经验依据的事实——一种变化的“历史趋势”，还经常与人的意愿相悖。有些人从传统中解救出来叫好，另一些人则指责这是文化的威胁——可以肯定的是，第二、第三世界的权力和思想精英们在思想及行动上对他们如何被送入漩涡之中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们（还）不能影响这个漩涡的中心，这个角色可能在下一个世纪留给了中国——但他们可以用抗议、部分地拒绝、创造性的革新、批判性有选择性的调整等方式来尝试对全球化进程对他们所在地区人们所起的作用加以控制调整。（特茨拉夫，1999a）

文化（包括宗教）作为一种自我主张的源泉已经趁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不但表现在后起发展的过程中，而且也表现在抵御令人感到恐惧不安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欧洲区域以外的文化以其更大的自信重新引人注目。”一位《现代东方》的敏锐的观察家指出：“文化之根又一次地向外伸展，以便发展具有社会合法性并已形成政治立场的新生力量。对产生文化和创造文明的西方不加批判的模仿照搬的时代已走向终结。”（斯泰因巴赫，1998，87）在东南亚也可以断定“片面性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特别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成就，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与全球转型局势相对立的新的基本模式。”（马切斯基，1998，285）

随着全球化的展开，产生了一种要求所有地方和区域文化朝着一定方向发展的适应压力和效益压力：这个方向大体由全球行为体预先设定。“西方”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历史优势，但目前不再具有垄断地位：当西方工业国家在过去 500 年间将自己建设成一个作为贯彻殖民政策的世界劳动分工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体系时，其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已从结构上影响了竞争资本主义世界市

场,比如私有财产的高度重要性,追求物质利益的“本质”,以及对个人(个体)公民人权的重视都属于这种结构。根据前现代社会如何借助其特有的文化机构迅速而顺利地适应世界经济体系的情况,世界市场作为从物质上平衡不同社会文化体系的舞台正在发挥着作用。这里的标准就是收益利润:为资本投资和资本利用寻找合适的地点。

世界区域差别:“文化结构”和“文化方式”

经验表明,在条件相同情况下,与西欧和大西洋社会模式功能等同的那些社会(例如儒家特色模式),应该得到‘世界资本’的偏爱,而其他比如以社会平等和团结为最高价值(例如非洲的部族联盟)的社会则宁可被避免。在这一点上,所有国家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都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尤其像‘善行’、‘宽容’、‘辛勤劳动’)。然而在伦理教育价值观的规范中,父母传授给孩子们的内容则存在着特定的差别,比如在亚洲,人们非常强调“独立自主性”和个人的“责任感”,而在非洲一些国家里这方面并不重要,而是“顺从”、‘崇敬祖先’以及‘宗教信仰’的价值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283)

如果在传统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体化过程中,文化继承一直发挥着作用,那么伴随着全球化,市场的文化特征及其向外辐射会变得更加重要,例如跨国企业已经“迫使国家更多地争夺有利的产地”(博恩希尔/特雷齐尼,1996,61)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要完成它们的双重任务,即一方面要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又要满足自己社会富裕的期望,那么它们就陷入了接受功能性妥协的困境。从全球行为体的观点来